

如何解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束缚

蔡 昉 王美艳*

内容提要: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在经历两个重要转折点时,经济增长会受到结构性冲击。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的转折点冲击主要在供给侧,导致供给侧潜在增长率降低;总人口到达峰值的转折点冲击主要在需求侧,可能导致需求侧潜在增长率降低。后一转折点主要通过人口总量效应、年龄结构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低,其获得的劳动收入下降十分迅速,因此,消费水平将随年龄增长而趋于萎缩。而且,由于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家庭养老均具有现收现付的性质,劳动年龄人口社保缴费负担重,消费有后顾之忧,在退休之前的年龄段上就出现消费减少的现象。扩大居民消费以保持总需求水平与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加大再分配力度,以及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普惠性和保障水平。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潜在增长率 居民消费 基本公共服务

作者简介: 蔡 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100732;

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00006。

中图分类号: F24 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02(2021)05-0005-09

DOI: 10.19795/j.cnki.cn11-1166/f.20210506.001

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人口转变的核心内涵是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其归宿则是人口老龄化。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已经长达近30年,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深。不仅如此,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因而老龄化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老龄化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是一个老年人口比重逐渐提高的波澜不惊过程,而是要经过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和总人口到达峰值,并伴随着与之而来的冲击(蔡昉,2020a)。人们普遍认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这个结论,但是,这种影响的产生逻辑和作用机制等相关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特别是,诸如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方式、在中国未富先老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以及方向正确且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应对等等,值得经济学予以更高的关注。

* 王美艳电子邮箱: wangmy@cass.org.cn。

如果说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转入负增长,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供给侧冲击的话,即将到来的总人口峰值和负增长时代,将更突出地从需求侧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冲击。也就是说,愈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将产生不利于需求扩大的效果。在第一次人口转折点出现之后,经济增长减速必然削弱出口和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最终消费特别是其中的居民消费,合乎逻辑地应该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因素。但是,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也是一个规律性现象。本文把如何破除人口因素对消费需求的束缚作为主题。

在讨论消费与年龄关系的场合,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 和 Brumberg, 1954) 的生命周期消费假说,得到最广泛的引述,成为经济学家思考相关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迪顿(Deaton, 2005) 分三个层次逐一递进地阐释了这个理论及其应用:第一层次着眼于消费(储蓄) 行为及其动机,即特定个体的消费行为与其年龄有关,年轻人需为年老退休时的消费提前进行储蓄;第二层次着眼于个体层面的消费(储蓄) 行为如何汇总为国家层面的财富分配,即对于某一特定时点而言,一国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个体的消费行为,可加总决定总体的居民消费(储蓄) 水平;第三层次着眼于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通过不同情景的假设做出关于消费(储蓄) 行为及其结果的判断。迪顿和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 和 Cao, 2004) 也都表现出对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以及储蓄行为的兴趣和关注。

此外,汉布尔格(Hamburger, 1954) 也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探讨消费行为,把个人根据面临的选择范围和自身偏好表现出的对不同消费产品(自然也包括服务,乃至公共服务) 的需求行为,从一时一地拓展到整个生命周期,其结论是,每个消费者都会根据生命周期的每一个时期,安排自己对特定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即每一个特定时期的总支出。因此,他们的消费取决于对终身支出能力的预期、不同产品和服务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可替代性,以及他们自身的消费偏好。

上述理论假说经历过赞成者和反对者的各种实证检验,结果莫衷一是。我们或许不必在意这些理论假说的检验结果,也暂不涉及相关理论假说的原创者对中国老龄化和储蓄率的引申含义。从本文的目的出发,即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两个转折点及其各具特点的经济冲击,着重阐释第二个转折点如何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我们只需借鉴已有经济学理论的有益框架,尝试认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需求因素变化的关系,阐释微观层面的生命周期消费行为如何在宏观层面的年龄结构变化中表现出来,揭示中国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哪些自身特点。本文也利用调查数据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进行实证说明,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二、老龄化的两个转折点及其冲击效应

经济增长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侧的条件所支撑的。生产函数可以刻画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条件,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数量、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即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 决定产出的数量或增长速度。国民经济恒等式则可以刻画经济增长的需求侧条件,即人们常说的需求“三套车”——净出口、资本形成(投资) 和最终消费制约产出的数量或增长速度。虽然只有供给侧的因素是产出之源,但是,需求侧的因素也是必要的产出条件,没有需求这个“出口”,经济增长便不能持续。所以,理论上可以把生产函数所描述的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叫作供给侧潜在增长率,而把国民经济恒等式所描述的需求侧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叫作需求侧潜在增长率。经济增长在这两方面的潜在能力,都与人口转变过程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

根据联合国数据,^①2010 年,中国跨过了以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为标志的转折点,此后的十年中,15~59 岁的人口以平均每年 235 万的规模减少。其直接的结果便是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缓、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因劳动力转移规模缩小造成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提高速度的减慢。这些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供给侧的冲击,直接表现为潜在增长能力的降低。也就是说,随着这个转折点的到来,由生产要素供给潜力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决定的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便开始下降。

关于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已有实证研究予以估算(Cai 和 Lu, 2013),并且为之后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所证实。如今,经济学家普遍按照逐年下行的潜在增长率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李雪松等,2020)。这里,我们不再赘述这些文献及其结论,而把关注点转向下一个人口转折点及其带来的需求侧冲击。图 1 是一个示意图,用以表达理论上的供给侧潜在增长率和需求侧潜在增长率,如何随着人口转变发生规律性的下降,特别强调这个总趋势的阶段性的特征,以及两个潜在增长率降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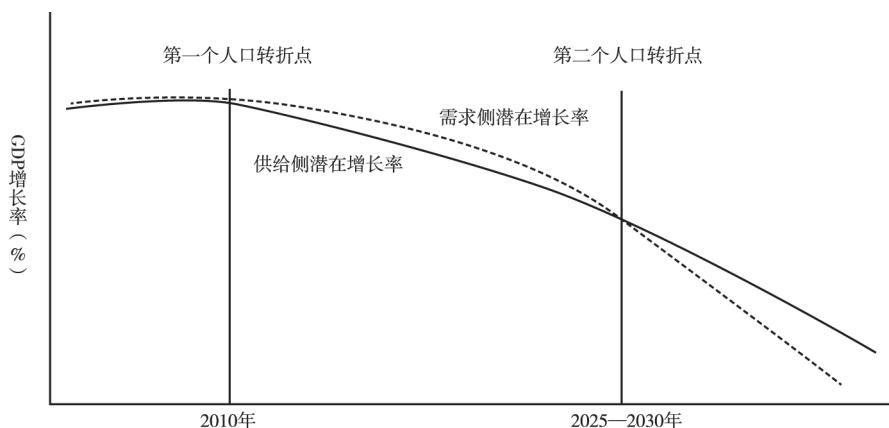


图 1 两个人口转折点与供求两侧冲击

联合国预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口总量将在 2025—2030 年达到峰值,在此之前人口自然增长呈现出不断减速的趋势,在此之后则是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无疑,总人口走向峰值的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供给侧冲击不断增强,并相应转化为需求侧冲击。例如,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导致出口的减速。以 2010—2019 年与 2001—2010 年进行比较,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的名义年均增长率分别下降了 9.9 个百分点和 23.3 个百分点。

同样地,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进而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也具有使消费增长减速的效果。例如,实际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就业扩大的幅度缩小,进而产生抑制居民收入增速的倾向。但是,与资本形成(投资)和出口相比,供给侧转化过来的因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在相同的两时期比较中,最终消费的增长率仅下降了 0.88 个百分点。然而,在总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到来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可能遭遇的冲击则会明显加大。

因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做出以下理论预期。第一次人口转折点标志着人口红

① 除非特别注释,本文关于人口预测数字均来自联合国(United Nations, 2015)。

利开始消失,必然导致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个过程已经发生,表现在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降,实际GDP增长率也呈现下行趋势(Cai和Lu, 2013)。根据需求因素的预期变化,我们可以做出的判断是,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将导致需求侧潜在增长率下降。至于需求侧因素的减弱是否制约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实现,则完全取决于政策应对的方向正确与否。

由于两个人口转折点分别对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产生更明显的负面冲击,所以,如图1所示,我们预期在第一个转折点之后,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下降速度快于需求侧潜在增长率;而在第二个转折点之后,需求侧潜在增长率下降速度很可能快于供给侧潜在增长率。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做出准确判断,从改革开放发展诸方面予以有效应对,可能出现实际增长率不能达到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的情形,就会像日本经济在丧失人口红利之后那样,在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不断降低的同时,需求侧潜在增长率下降更快,以致经常出现增长缺口(蔡昉,2020b)。

三、老龄化影响消费需求的三种效应

总体而言,世界经济持续处于“长期停滞”新常态、逆全球化加速和供应链脱钩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特征,都使得出口和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相应地,需求侧潜在增长率更需依靠消费的扩大。由于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率(最终消费总额占GDP比重)显著偏低,并且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较快,因此,最具潜力的需求因素是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以总人口到达峰值为特征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对居民消费需求也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从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影响消费的角度来观察,有三种效应已经开始显现。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从个体角度来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但是,在家庭共济的条件下,每一个人无论是否工作都要消费,即便没有劳动收入的家庭成员,也同等进行一般性的生活消费。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人口总量增加消费就扩大,人口总量减少消费就萎缩。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已有的研究认为,消费水平倾向于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Hurst, 2008),这也可以由中国的经验得到证实。然而,随后我们将说明,这个效应的表现比较复杂。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在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条件下,社会总收入的较大部分为边际消费倾向低、从而储蓄率高的富裕群体获得,与此同时,相对贫困的群体却未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并且往往还要进行预防性储蓄。

在利用调查数据对上述效应做出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先对拟采用的调查数据和计算方法进行简单说明。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等六个城市进行了家庭户调查(简称“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抽样总体是城市主城区中所有居委会的常住人口,既包括城市本地人口,也包括常住在这些居委会中的外来人口。我们将使用抽样得到的3800户城市本地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劳动收入和涵盖内容不尽相同的消费支出。

具体来说,我们使用调查数据分析劳动收入与消费的生命周期变化,也就是观察分年龄的劳动收入和消费水平。在度量消费时,人们通常将消费区分为两种类别:第一是具有明确可分性的消费,即可以以个人为单位的消费,例如医疗和教育支出;第二是不具有明确可分性的消费,是指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容易进行区分,因而只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共同消费,例如食品和居住等支出。本调查中的消费依据国家统计局“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的统计口径,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八个类别。其

中,医疗和教育消费以家庭成员个人为单位进行收集,其他类别消费以家庭为单位收集。

因此,在计算城市居民的年人均消费支出时,需要把以家庭成员个人为单位的消费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同消费进行合并。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在家庭成员之间均分的假定下,我们利用调查数据先将这部分消费类别加总起来,然后计算其年人均消费,再与以家庭成员个人为单位收集的消费类别进行汇总,这样就可以得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年消费支出,并且获得分年龄消费支出水平的信息。至于分年龄的家庭成员劳动收入,则可以直接计算出来。表1列出了相关的计算结果,即0~100岁之间每个年龄家庭成员的人均消费支出(含消费和社保缴费)和劳动收入。

表1 分年龄人均消费支出和劳动收入 单位:元/岁

年龄	全部支出	劳动收入	年龄	全部支出	劳动收入	年龄	全部支出	劳动收入
0	31278	0	33	32470	83693	66	36248	2390
1	31061	0	34	32434	69933	67	32368	142
2	24931	0	35	36906	83692	68	32951	499
3	38283	0	36	33223	66471	69	32298	0
4	40626	0	37	34348	80421	70	31025	829
5	44129	0	38	41299	81922	71	35829	322
6	41274	0	39	33485	78380	72	33320	1488
7	43158	0	40	29137	66906	73	32747	0
8	47273	0	41	33756	70214	74	29356	0
9	41006	0	42	33877	60856	75	38571	0
10	33238	0	43	28236	49926	76	33523	265
11	34506	0	44	28223	58836	77	32290	2188
12	34562	0	45	27058	48340	78	37363	1736
13	38465	0	46	29390	53725	79	33054	0
14	39315	0	47	31881	40945	80	32169	0
15	35195	0	48	31572	51771	81	26920	0
16	36054	576	49	32165	53052	82	32503	0
17	36157	0	50	25376	34227	83	28603	0
18	42848	1301	51	30928	30454	84	34541	0
19	39042	2178	52	33264	30249	85	22373	0
20	41811	2657	53	31678	21295	86	27655	0
21	35478	7644	54	29431	30360	87	20443	0
22	43051	11957	55	31336	24643	88	27650	0
23	55984	23236	56	29697	16997	89	26448	0
24	39463	26544	57	26532	20805	90	32909	2237
25	53601	34974	58	34691	13297	91	21022	0
26	36202	45417	59	32990	16965	92	56982	0
27	33460	46341	60	29093	3106	93	39093	0
28	32585	64280	61	31818	798	94	14994	0
29	42595	55803	62	29663	602	95	30145	0
30	40085	62146	63	35861	1432	96	13116	0
31	34078	65121	64	40108	1854	99	39300	0
32	39698	74658	65	38201	714	100	32417	0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利用计算出的调查数据,我们还可以根据分析目的,对消费数据所包含的内容做一些技术处理或取舍。例如,为了说明不同年龄的特征性问题,在图2中,“消费1”表示的消费中包括了医疗支出;“消费2”系在“消费1”的基础上加上劳动年龄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缴费;“消费3”则是剔除了医疗支出后的老年人消费。下面,我们主要结合图2来描述人口年龄因素影响消费需求的几种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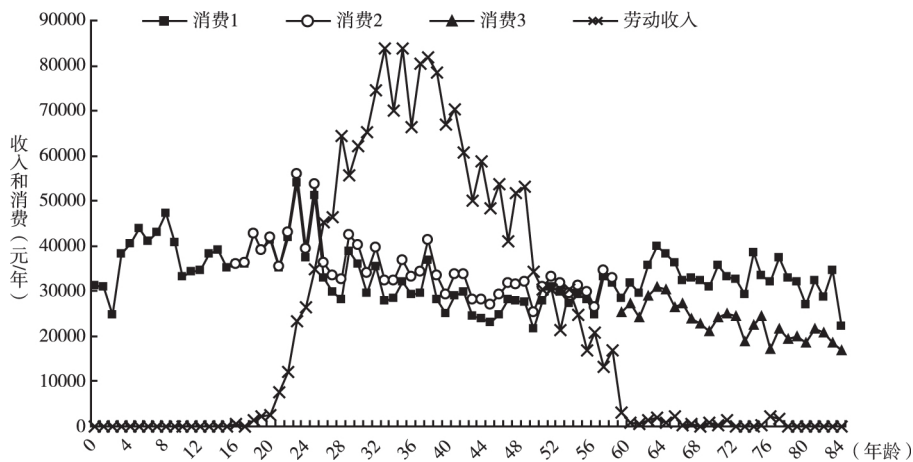


图2 分年龄城市住户人口的收入和消费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如图2显示,由于就业参与具有年龄别差异,劳动收入仅仅出现在20~60岁之间,大约在30~40岁之间达到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劳动收入在年龄分布上是极端不平衡的,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形成一个陡然的倒U字形曲线。然而,在每个年龄上的消费差异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可以说,消费与劳动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存在。至于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下降的假说,也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地体现在老年人消费水平低于劳动年龄人口,而是以更为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随着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孩子对于家庭越来越金贵,与少年儿童教育相关的成本越来越高,家庭花在子女身上的消费支出增加。图2中显示出消费水平在青少年年龄段是最高的,峰值发生在23~25岁。从宏观数据也可以看到教育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占比的确很高。例如,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阶段的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8375元,其中城镇为10938元,农村为4595元。全国生均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高达55.35%,其中城镇为56.10%,农村为47.57%(黄春寒、魏易,2019)。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社会保障缴费(本调查数据中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项)负担较重,导致这个人口组的消费甚至低于青少年人口组和老年人口组。鉴于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还是现收现付的性质,图2中“消费2”与“消费1”之间的差别,意味着消费从劳动年龄人口向老年人口的转移(虽然不是通过家庭内部的共济)。换句话说,如果把社会保障缴费的负担显著降低并相应转变成消费,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本可以更高。

最后,临近退休和刚刚退休的人口,劳动收入下降的速度很快,同时还要负担社会保障缴费,或许还由于临近退休而产生较为强烈的预防性储蓄意愿,因而也是消费水平最低的人群。总体来说,这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特点相关,即随着年龄的提高,受教育程度递减,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愈加明显。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20~34岁人口组中,受过

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 39.8%，随着年龄提高这个比例便依次递减，35~49 岁人口组降低到 23.4%，50~64 岁人口组进一步降低到 16.0%，而 65 岁以上人口组仅为 8.5%。因此，那些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必然处于劣势地位，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

由于在图 2 中所使用的消费数据，除了医疗和教育消费是以家庭成员个人为单位收集的，其他类别消费均以家庭为单位收集，因此，数据中显现出来的已经没有劳动收入的老年人仍然得以保持较高水平消费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家庭共济的结果（或者仅仅是由于数据中无法识别家庭成员之间真实的消费差异）。同时，也由于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较高，因而从数字上抬高了他们的消费支出。

鉴于中国家庭的户主年龄一般来说可以代表家庭是相对年轻型还是相对老年型，我们可以依户主年龄划分，观察劳动收入和（剔除医疗费用后的）消费与家庭年龄类型的关系。^① 如图 3 所示，越是在老年型的家庭中，劳动收入和消费水平都越低，当然，其中劳动收入降低的幅度显著大于消费的降低幅度。都阳和王美艳（2020）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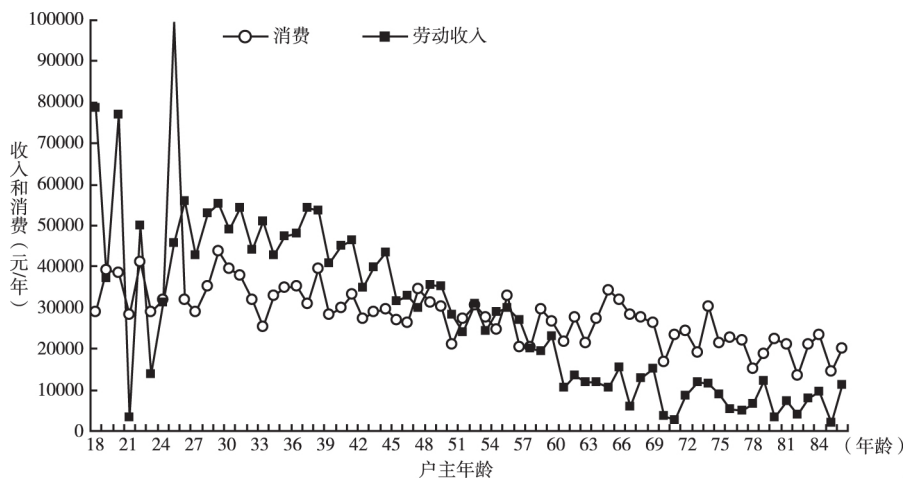


图 3 分户主年龄的劳动收入与消费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宏观数据也显示出与此相一致的结果。由于社会养老还处于广覆盖、低水平的阶段，养老金支付水平仍然很低，因此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并不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按照城镇退休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计算，每人领取养老金为 39989 元，比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 5.6%；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人数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计算，每人仅为 1943 元；根据这两种基本养老保险领取人数加权计算，平均的给付水平为 18468 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1%。

四、应对老龄化消费冲击的政策建议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已经发生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从供给侧着眼，

^① 在本调查中我们发现，老年型家庭在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支出比年轻型家庭高出 213%。

立足于通过改革获得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供给侧潜在增长率。进一步,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要把政策重点落在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方面,通过稳定和扩大需求因素,提高需求侧潜在增长率,以保障实际经济增长率与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相符。

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从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以及显著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入手。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保持同步,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然而,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也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均等的收入分配格局,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质性缩小城乡之间和收入主体之间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多数年份处于提高的状态,并且自1993年之后即高于0.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这固然反映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人力资本回报率提升的激励效果,同时也暴露出在城乡居民收入整体提高的过程中,部分群体收入的增长速度不正常地超过了其他群体,从社会公正角度看,属于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随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基尼系数在2009年以来有显著的缩小趋势。但是,一方面,这个收入分配改善的效应趋于递减,另一方面,基尼系数仍然显著高于警戒水平。这说明,主要通过生产要素市场进行的初次分配,不足以产生根本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效果,要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4之下,必然需要加大政府实施再分配政策的力度。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剔除智利和墨西哥)较为合理的收入分配状况,终究是实施再分配政策的结果,即通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等手段,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从初次分配后的平均0.473下降到0.306,降低的幅度高达35.3%。^①固然,更具有累进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有效且立竿见影的再分配手段,然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针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实施再分配应该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着眼和发力。

社会保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和加深的因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应做到供给的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给付的可持续;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应提高普惠水平,同时在缴费的基础上开辟更广泛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保持养老基金的价值增值、提高国有资产划拨充实社保基金的制度化和机制化水平,确保在抚养比进一步提高情况下养老金可持续支付。

2019年,中国有9.7亿人口获得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其中55.0%的人口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是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以及城镇居民中非就业人员或者灵活就业人员;其他45.0%系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覆盖,其中也分为两种类型:大约87.2%系企业职工,其余部分系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目前,不同类型的基本养老保险之间存在着待遇上的差别,特别表现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这个现状可以引申出两点政策含义:其一,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水平,需要着力缩小针对不同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险项目之间待遇水平的均等化程度;其二,鉴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系自愿参加、低缴费率以及各级政府予以补贴,因此,从这个模式入手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普惠性,是在扩大覆盖率基础上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可选路径。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应为下一个人口转折点未雨绸缪吗》,《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a年第10期。

^① 作者根据OECD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参见OECD数据库官方网站, <https://data.oecd.org/>。

2. 蔡昉《中国经济如何置身全球“长期停滞”之外》，《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b 年第 9 期。
3. 都阳、王美艳《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模式——对老年家庭的着重考察》，《人口研究》2020 年第 6 期。
4. 黄春寒、魏易《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现状》，载魏易主编《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5. 李雪松、陆旸、娄峰、冯明、张彬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及指标研究》，载谢伏瞻主编《迈上新征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6. Cai, F., & Lu, Y.,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Garnaut, R., Cai, F., and Song, L. (eds.),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nberra: ANU E Press, 2013, pp. 55 – 74.
7. Deaton, A., Franco Modigliani and the Life-cycle Theory of Consumption. *BNL Quarterly Review*,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Vol. 58, 2005, pp. 91 – 107.
8. Hamburger, W., The Determinants of Aggregate Consump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2, No. 4, 1954, pp. 23 – 34.
9. Hurst, E., The Retirement of a Consumption Puzzl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789, 2008.
10. Modigliani, F., & Brumberg, R. H.,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in Kurihara, K. K. (ed.),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388 – 436.
11. Modigliani, F., & 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LII, 2004, pp. 145 – 170.
12.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VD Edition, 2015.

Unbinding Restraints on Consumption Imposed by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CAI F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732)

WANG Meiya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006)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urning points in population aging that have reverse impacts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peak of working-age population that already appeared in 2010 has mainly affected the supply side,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supply-side potential growth rate. The peak of total population predicted to arrive in 2025 – 2030 is more likely to affect the demand side,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demand-side potential growth rate. This paper reveals how the peak of total population tends to weaken consumption via its effect on the population size, age structu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urban labor survey shows that as the Chinese elderly have low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lose labor income earlier, there is a tendency that when they get older, they consume less. Due to the pay-as-you-go nature of the pension insurance and home-based elderly care, the decline in consumption occurs as early as at late working age. Policies of promoting consumption to match the aggregate demand with supply-side growth potential should be adopted, such as increasing household income,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stepping up redistribution, and expanding the coverage and enhancing the benefits of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Potential Growth Rate, Resident Consumpti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JEL: E21, J21

责任编辑: 无 明